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Image:
Studie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West

岳峰 著

儒经西传中的翻译 与文化意象的变化

福建人民出版社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Image:
Studie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West

岳峰 著

儒经西传中的翻译 与文化意象的变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经西传中的翻译与文化意象的变化/岳峰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2

ISBN 7-211-05416-6

I. 儒... II. 岳... III. 儒家—传统文化—传播—西方国家 IV. B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238 号

儒经西传中的翻译与文化意象的变化

RUJING XIZHUAN ZHONG DE FANYI YU WENHUA YIXIANG DE BIANHUA

作 者: 岳 峰

责任编辑: 李文淑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华悦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新店南平东路鼓楼工业区 8 号楼 邮 政 编 码: 350012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1-05416-6

定 价: 15.3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上篇 宏观的视野：儒经西传与文化意象的变化	
第一章 16 至 18 世纪：初识儒经与“中国热”	17
第一节 中国缘何引来了西洋人	17
第二节 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的儒经译介	20
第三节 法国的儒经译介、研究与哲学界的回应	31
第四节 儒经在德国知识界的传播效应	48
第五节 英国的儒经译介与知识界的回应	53
第六节 俄国汉学家的儒经译介与社会背景	57
第七节 从崇拜到摈弃：反思	59
第二章 19 世纪：余风流韵中的勃勃生机	64
第一节 英国汉学家的儒经译介及其儒经观	65
第二节 法国汉学家的儒经译介及其儒经观	69
第三节 德国汉学家的儒经译介与文人、哲人的回应	73
第四节 俄国汉学家的儒经译介与文学界的回应	79
第五节 儒经在美国知识界的传播效应	83
第六节 纷繁画面中上升的儒学译介事业	89
第三章 20 世纪至今：复兴的儒学	92
第一节 美国汉学家的儒经译介、传播与研究	94
第二节 英国汉学家的儒经译介与研究	106
第三节 法国汉学家的儒经译介与研究	113
第四节 德国汉学家的儒经译介、研究与哲学界的回应	117
第五节 苏俄、瑞典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儒经译介	126

下篇 微观的视角：儒经翻译的文本分析

第四章 《四书》翻译研究	136
第一节 说东道西话《四书》之译	136
第二节 走向读者还是让读者走近：《论语》译名析	150
第五章 《诗经》翻译研究	157
第一节 一部被忽略的译本，一桩译事“冤案”	157
第二节 中西合璧：合作翻译	163
第三节 韦利与翟理斯之争	165
第四节 《关雎》的五种译文比较	168
第六章 《尚书》翻译研究	175
第一节 古韵与力度的再现	175
第二节 遭遇诘屈聱牙	178
第三节 一词多译、丝丝入扣	182
第七章 《礼记》翻译研究	187
第一节 从风格到措辞	187
第二节 在宗教与翻译之间：从超自然现象的译法说开去	200
第八章 《周易》翻译研究	211
第一节 无奈于文化的互缺：《周易》英译本正误辨	211
第二节 止步于玄幻的殿堂前：《周易》英译本风格探	216
第九章 《左传》翻译研究	228
第一节 忠实的是非	228
第二节 词义的辨析	231
第三节 注释的功用	233
结语	236
附录一 《四书》、《五经》西人译本考	247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62
附录三 当代美国学者论西方儒学研究	277

绪 论

一、本书的缘起

我们这代人，大概对“文革”期间“批孔倒儒”的风潮记忆犹新，对书里看到的“五四”运动中“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也有印象。然而今天，约有 108 所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欧洲有 41 所，美洲 27 所，大洋洲有 3 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5 年 9 月在巴黎决定设立“孔子教育奖”，中国教育的鼻祖孔子成了世界教师的代言人。在“100 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孔子在世界大师中排名第五。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中说到：“儒学思想于公元 17 世纪远播欧洲，在欧洲形成长时间的中国文化热，并为近代欧洲社会变革，尤其是启蒙思想家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1793 年法国大革命起草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引用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许多欧洲思想家都推崇孔子的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借鉴了中国儒家的辩证哲学。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书中还写道：儒家哲学对法国大革命民主理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以此为媒介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儒学进一步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门。”

“经过千年传承以及与各国先进文化的交融，今天的儒家学说已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和人类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¹

这位在海外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的春秋伟人虽在他的出生地屡次被妖魔化，但他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影响至深且巨，尽管人们对儒家哲学可能“日用而不知”，但它在老百姓所传承

¹ 王毅：《弘扬东方文化，构建和谐世界——在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中国大使馆网（<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2005/11/17）。

的理念上留下的印记早已泯灭肌髓。用一句老话来说，这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今天，我们正面对着文化全球化的巨大压力，面临着“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以及国人对自身文化自卑自扁的心态。鉴于此，了解孔子与儒家经典如何藉由翻译传到西方，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应的历史事实，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恢复民族自信，制定对外宣传策略，都具有现实意义，正如张西平先生所说：

“必须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¹

二、学术的回顾

1. 儒经西行四百年

关于儒家经典²西传的历程，史学、汉学、哲学与宗教学的学者有不少研究成果。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在国内算是涉及该课题的开山之作（1938年完稿）。但历时多年，随着中国学界学术气氛的逐渐宽容与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书中一些极“左”的观点不可能再被认为是磐石不动的定论。事实上，其后的研究在观点上多少都出现了变化。其中，仍从哲学角度入手的有季美林的《中外哲学交流史》、楼宇烈与张西平的《中外哲学交流史》。从比较文学角度入手的有汪介之与唐建清的《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陈义海与常昌富的《东海西海——从明清间儒学与天学的交涉看中国比较文学之渊源》。从法学角度出发的有史彤彪的《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法律文化

¹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页3。

² 通常意义上的儒家经典以《十三经》为代表，即《易》、《诗》、《书》、《礼》、《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与《尔雅》。本书所研究的儒经集中在欧美人士翻译率最高，提及最多的《四书》（《论语》、《大学》、《中庸》与《孟子》）、《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与《春秋》）。为措辞方便，称为儒经。

的认识》。

从史学、汉学视角入手的研究数量甚多，比如有朱仁夫、魏维贤与王立仁的《儒学国际传播》，马祖毅、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何寅、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张维华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刘登阁与周云芳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吴孟雪与曾丽雅的《明代欧洲汉学史》，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王殿卿的《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李学勤的《国际汉学漫步》与《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刘正的《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 20 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黄长著、孙越生与王祖望的《欧洲中国学》，王化元的《海外汉学丛书》，李雪涛的《“中国停滞论”的汉学遗产》，张允熠的《关于 16 至 18 世纪之“中学西渐”的反思》，郑大华的《论民国时期的中学西传最新消息》，吴孟雪的《论西欧汉学起源史上的重要一页》，段怀清的《他们为什么翻译儒家经典》，尹飞舟的《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传——为经典教育而作》，张西平的《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应重视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与《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对四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检讨》。国外的有（法）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与（美）唐纳德的《亚洲之于欧洲的造就》。（美）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也涉及这段历史；作者从宏观的视野考察世界历史规律，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比如，关于西方人的东方兴趣转移的描述。事实上，西方学者对中西交流的研究比中国学者早，因为前者的研究从中西交通一开始就有了。

比较重要的检索工具书有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考狄尔的《在华文献索引》、袁同礼的《西方的中国文献》、巴那特的《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文献》、凯瑟琳的《教务杂志索引：亚洲差会指南 1867—1941》。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家资源库可圈可点，尽管在某些细节上还可以进一步完善。笔者在国外访学期间，常感叹于名牌大学图书馆馆员水平之高，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这个学术工程说明我们的图书馆正在与国际接轨。此外，中国文学网的汉学园地、儒学网、国学网与孔子 2000 网也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在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关于下列几个专题的探讨。

其一，从 16 世纪末来华的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开中西沟通风气之先，各种差会、教派的传教士接踵而来，客观上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更广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着眼于传教士的研究成果有尚智丛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余三乐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赵晓阳的《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以〈四书〉〈五经〉为中心》、谭建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学西渡》、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王晓朝的《中西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兼评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王树人的《文化会通的历史之镜——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以及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在十七世纪的欧洲——以耶稣会士报告的中国形象为中心》、《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与吴莉苇合著）。此外还有（法）埃德蒙·帕里斯的《耶稣会秘史》、（法）谢和耐的《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其二，早期在华耶稣会士采取“合儒”的传教策略，力图消释天儒冲突，采取在儒家经典中寻找天主教印记的“索隐”式解经手法，得出儒教与天主教多方面一致的结论，这是 17 世纪汉学家研究儒经的风气，对后来——包括 19 世纪——的汉学家仍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有刘耘华的《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于明华的《清代耶稣会士索隐释经之型态与意义》、杨宏声的《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古伟瀛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的诠释及其演变》、姚兴富的《耶儒对话与融合》、卓新平的《基督宗教论》、陈义海的《万里东来 来相印证——〈天儒印〉研究》、（美）魏若望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与欧洲》与迈克尔的《耶稣会士的索隐》。

其三，中西方从沟通开始，双方对彼此就产生了印象。由于西方的中国观见诸系统的论著，中国学者有资可据以研究这个专题，成果包括张国刚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柳御林的《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何兆武与柳御林的《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吕超的《外国人的中国观》、乐黛云的《世界文化总体对话的中国形象》、陈融与邹溱的《博观与辨析——西方学者论东方文化》、杨焕英的《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周宁的《2000年西方看中国》、宋太庆的《中国时代》、忻剑飞的《世界的中国观》与宋晞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国外的有（美）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与梅森的《西方的中国与中国人概念》，此外还有一些档案式的资料，比如新教传教士上海传教大会记录。以上所涉及的是西方广义上的中国观，但本书更为关注的是西方的儒家观、孔子观，这是与中国观既相关联，又略有区别的概念。本书这种提法的依据是一些西方学者可以一面批判中国，一面赞美孔子，比如美国作家爱默生就是典型；更复杂的是德国哲学家韦伯，他提出儒家文化阻碍科学发展的观点，但却非常仰慕孔子。此外，中国人的西方观在19世纪及之前的中国出版物中并不多见，不过，捍卫儒学的怪杰辜鸿铭却独树一帜，他的西方观与西方人的儒家观之互动是中外交流史上令人饶有兴味的话题，有关研究见钟兆云的《解读辜鸿铭》与黄兴涛的《闲话辜鸿铭》。

除了从宏观的角度俯瞰儒经西传的历程外，深入研究德国、法国、英国、苏俄与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儒家文化社会效应也是很有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是“中国热”的起源地，“中国热”由此传到德国、英国与其他国家。18世纪的伏尔泰是为儒学鼓与呼的马前卒，他的部分相关观点见于《哲学辞典》（上册）与《风俗论》（上册）。而首先批判中国的学人之一却是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人孟德斯鸠，后者著有《论法的精神》。当代史学家艾田蒲因措辞激烈地维护儒学而被公开指名道姓地指为“中国狂”，他著有《中国之欧洲》。研究儒学在法国的传播效应的有阎宗临与阎守诚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沈大力的《伏尔泰与中国古典文学——写于中法文化交流年》、李力的《伏尔泰的中国情结》、吴孟雪的《柏应理和中国哲学家孔子》、叶潇

的《艾田蒲看“中国礼仪之争”》与赵峰的《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化》。法国学者的论述有维吉尔·毕诺的《中国文化对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影响》、戴仁的《法国当代中国学》、龙巴尔等人的《法国汉学》系列。法国启动“中国热”之后，19世纪及其后的法国学者潜心译介¹儒经，哲人虽没有多少宏论，但总体上法国学者对儒学一直保持一种平稳的亲和心理。

德国知识界对儒学的反应，不管是热情的支持还是尖锐的批评，在西方世界上可能都是最有影响的。德国学人的观点可见诸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卷1、康德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莱布尼茨的《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夏瑞春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等译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7、32）有相关的内容，虽然都是一笔带过。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向世陵的《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张伟与杨武能的《歌德——“魏玛的孔夫子”》、张西平的《最后的文艺复兴人物——基歇尔笔下的中国》、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张志扬的《思想方式与中国观——几位德国思想家的中国观分析》。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法）杜瑞乐的《从法术到“理性”：黑格尔与中国宗教》、（德）亚克西姆·纳得考的《马克思·韦伯眼中的孔子：韦伯中国史观中的精神与自然力》、（日）五来欣造的《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德国哲学家在西方世界引发过几个关于儒学问题的长期争论。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推崇由于他本身特殊的社会地位与科学成就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关注，有关论述见焦树安的《莱布尼茨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发明与《周易》的伏羲八卦图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论述见胡阳与李长铎的《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二进制是西方科学的骄傲，然而欧洲中心论者却对伏羲八卦图的启发作用耿耿于怀，对莱布尼茨将伏羲称为“科学始祖”的说法更是不满，相关研究见胡阳与李长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前没有见过先天图吗——对欧洲现

¹ “翻译”与“译介”是本书的高频词，“翻译”指把原文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行为或结果（即译作）。“译介”不仅包括翻译，而且有对原文的介绍、研究及其它有助于原作品传播的作为。

存 17 世纪中西交流文献的考证》与《现代欧洲中心论者对莱布尼茨的抱怨》等系列论著。黑格尔是一个人格奇特的哲学家；他一面借鉴儒学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一面对儒学发难，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总体偏见；最严重的是，黑格尔从质疑中国的哲学地位发展到彻底否定儒学的哲学地位。对此，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有苗润田的《中国有哲学吗？——西方学者的“中国哲学”观研究》、李雪涛的《黑格尔，平庸化中国形象》、王子仪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等。黑格尔之后，当代哲学家韦伯提出“儒学妨碍科学发展”的观点，不过作为现代的哲人，他完全没有当年黑格尔的骄蛮。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与何爱国的《马克斯·韦伯：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介绍过他的基本观点。学人对此看法有异，比如马建明的《从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比较谈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持类似韦伯的观点，但一些西方学人，比如狄百瑞，对韦伯的观点有过尖锐的反驳。半个世纪前，雅斯贝尔斯又有了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儒经解读观，为中国的哲学地位“平冤”，观点见于《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等书。

英国学者的儒经观见于罗素的《中国问题》、休谟的《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 1）。相关研究有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缪崧的《阿瑟·韦利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王绍祥的《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博士论文）、网文《〈访韩日记〉（四）中国文化世纪》与（美）艾德蒙·莱特的《中国儒教对英国政府的影响》。如果说法国曾是汉学的盟主，那么在 19 世纪及其以后的时间里，英国的儒经译介事业持续地影响了世界汉学，并直接推动了美国等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

俄国对儒经的接触较西欧国家晚，但沙俄政府向清朝派出过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汲取儒学的文化精华。俄国社会也曾像西欧国家那样出现过“中国趣味”的热潮，也有托尔斯泰、普希金这类大师推崇儒学，总体来说，苏俄汉学家的儒学研究一直处于谦虚钻研、稳步上升的状态；汉学家们的平稳态度与俄苏政府的多变态度形成了对比。相关的研究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情报中心编的《俄苏

中国学手册》(上、下)、李明滨的《中国文学在俄苏》、肖玉秋的《18世纪俄国来华留学生及其汉学研究》、李随安的《洪流与溪涧：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问题》、栾景河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徐万民的《关于清季俄国汉学史的几点思考》、陈开科的《莫斯科的“孔夫子”——记俄罗斯科学院著名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博士》、杨建民的《托尔斯泰与老子》与俄苏学者李福清的《前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概况》。

此外，意大利人利玛窦可谓近代史上西传儒学的鼻祖，故中外学者着墨不少，如林金水的《利玛窦与中国》、许明龙的《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韩)宋荣培的《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与儒学的融合和困境》、(法)裴化行《利玛窦评传》、(韩)宋荣培的《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与儒学的融合和困境》、(美)邓恩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及何高济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美国旧金山大学有个利玛窦研究所，聘请各国学者提供研究资料，也曾请笔者撰文。瑞典的儒学研究也别具特色，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对此做了相关描述。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依据《周易》的原理开创了心理学研究的新途径，与此相关的研究有申荷永的《引论：心理学与中国文化》、高岚与申荷永的《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与《〈易经〉与中国文化心理学》。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学者在18世纪末才逐渐接触儒经，初期总要依赖英国汉学家译介的儒经进行研究，但其后期的发展令人瞩目。现在美国是儒学讨论最热的国家之一，当然这种现象除了美国学界的中国渊源，也与一些身居显赫学术地位的华裔学人有关，比如运用伽达默尔手法诠释儒经的成中英与倡导新儒学的杜维明。相关研究，中国的有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王守仁的《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对梭罗的影响》、林立强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刘海平的《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郭齐勇编的《杜维明文集》、方朝晖的《儒学在美国：动向与反思》、王晴佳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常耀信的《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王建平与曾华的《美国战后中国学》、程钢的《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王波

的《孔子学说正从中国哲学变成世界哲学》、仇飞华的《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何爱国的《理性的真诚：一个美国外交官眼中的晚清中国人印象——读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程钢的《人是礼仪的存在——芬格莱特对礼的阐释》、吕秀才的《孔子——即凡而圣》与新浪网文《庞德的壮丽错误》；美国的有成中英的《中国哲学当前的核心和周边问题》与《宗教对话与文化融合》、陈荣捷的《中国哲学原始资料选》与《近代中国宗教之趋势》、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郝大维与安乐哲的《孔子哲学思微》、何天爵的《真正的中国佬》、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卜德的《中国思想在西方》与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

以上对一些相关的背景文献进行了粗略的归类，但其实交叉重合的研究非常多，不好细分，而研究中重复的内容也很多。多数作品中与儒经及其西传这个课题直接挂钩的内容并不多，有的书笔者读完之后，能够引用的只有一句话。但就学者们自身拟定的研究目标来说，即使是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这些见仁见智的研究成果各有其价值，为中西沟通的不同领域做出了学术贡献。从上世纪80年代起，相关研究含金量越来越高，态度越来越客观，应景式的批判少了，史料愈发详实，像张国刚、张西平、刘耘华、卓新平等人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

某些研究成果也有一些有待商榷之处。其一，某些论著的作者可能出于对儒家思想的偏爱，有意或无意地误读或夸大西方哲人对儒经的评价，比如德国哲学家谢林、黑格尔对儒经的观点明显褒贬多，但在有些论、著中，这类观点被体现为对孔子思想的一味赞美或被模糊为“新诠释”。伏尔泰对儒家的态度实际上经历了一些变化，从高度颂扬到贬斥，但有的相关研究文章所传达的信息或给人的印象却非如此。有的学者把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段学人的溢美之词提取出来一哄而上，给人很热闹的戏剧场面，但学术还是应该基于实事求是的事实分析。关于西方哲人对儒经的评述在哲学界的学者笔下可能表现得更为精确。其二，尽管学者多少会关注西方学人的年代、国别，但有些文章在总体时间、地域脉络的梳理上欠清晰，而同样未理清的是西方

人观点的多面性。比如，有的文章给人感觉某个国家的学者一贯颂扬儒学。其实西方知识界对儒家思想有一个相对的沉寂期，比如 19 世纪的西欧。其实，即使在“中国热”时期，西欧学者也不是真的对儒经一片叫好，包括在法国，当时剖析儒家思想的负面的思潮已成滥觞。只有从时间、地域的脉络，兼顾西方社会舆论的正、反面观点去爬梳，才能看清儒经文化意象确实存在的变异情况。其三，有些译著被无数次地引用，比如，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但其他许多译著被忽略或一笔代过，语焉不详，给读者的全面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儒经译本的整理也确实有相当的难度，而且有吃力不讨好之嫌。其四，翻译问题。有些译著，有时也有翻译方面的老问题，有些文字读起来颇为费劲，甚至难以引用。非史学、汉学的学者有时在翻译汉学家的姓名时忽略了语言的历史处境，比如把 Dr. Walter Henry Medhurst（麦都思）译为“米德霍斯特”。明、清乃至民国之际的传教士、汉学家往往自有汉名，不能以现代标准音译名为标准来译。这样的名字并不是改名而得，故有些作品中“原名”的提法不妥。

2. 儒经翻译的研究

可能是掌握英语的学者比较多的缘故，儒经翻译的研究多集中在英语译本，其他语种的译本少人问津，国内外均如此。但研究儒经汉英翻译比较多的美国学者、香港浸会大学的费乐仁教授近年也开始研究德国的汉学家卫礼贤。澳大利亚学者鲁尔在其专著《孔子，还是孔夫子？耶稣会士的儒学诠释》中将索隐派耶稣会士的儒经拉丁文译文转译为英文，虽然篇幅不大，但颇有价值。我们期盼有更多的这类译文产生，对多数中国学者来说，这可能是直接研究儒经索隐问题的惟一途径。

可能与资讯有关，学者的译文文本研究多集中在理雅各、韦利、翟理斯、苏惠廉、老安的译本，再有就是近代史唯一挤入传教士翻译大军的中国人辜鸿铭之译作，这当然也与这些人的名气有关系。同样也可能是资讯匮乏的缘故，《四书》、《五经》译本中有的文本问津甚少，比如《礼记》与《春秋左传》。

但总的来说,来自不同地域的学者、代表不同观点的著作和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儒经译本进行了各有见地的分析。涉及《四书》翻译研究的成果有中国大陆语言学者樊培绪与楚至大的《理雅各、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不及与过》、刘重德的《关于大中华文库〈论语〉英译本的审读及其出版——兼答裘克安先生》、楚至大的《难能可贵与美中不足——评理雅各两段〈孟子〉的译文》、韩彩英与王正仁的《语境差别与文献翻译中的语境补全》、曹悼的《〈论语〉英译本初探》、甌春亮的《谈谈〈论语〉的三种译本》、刘重德的《校注〈汉英四书〉杂记》、廖名春的《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陈浪的《理雅各英译〈论语〉研究》、陈飞亚的《一经一纬织美文——评理雅各英译论语》、林佩璇的《辜鸿铭译儒经之我见》、笔者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语〉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黄雪霞,2006)、中国大陆历史学者黄兴涛的《文化怪杰辜鸿铭》、王辉的《〈论语〉中核心概念词的英译》、汪堂家的《乱世奇文:辜鸿铭化外文录》、柳存仁的《百年来之英译〈论语〉其一——读西蒙·李(Simon Leys)新译〈论语〉》、顾蕻的《〈论语〉在海外的传播》、中国台湾学者闾振瀛的《理雅各氏英译论语之研究》、美国学者费乐仁的《服伺圣人还是闷死圣人——理雅各等〈四书〉译者研究》。此外,辜鸿铭的《中国学》、《辜鸿铭文集》和《中国人的精神》及林语堂的《信仰之旅》也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涉及《诗经》翻译研究的成果有费乐仁的《被遗忘的珍本:理雅各的〈诗经〉译本》;大陆语言学者汪榕培的《说东道西话〈诗经〉》、《殊途同归译〈诗经〉》、《漫谈〈诗经〉的英译本》、许渊冲的《诗经》;台湾学者张上冠的专著《失落的水平线:〈诗经〉英译研究》与西方汉学家阿尔伏雷得·理斯特的《理雅各博士的诗经翻译》。

涉及《尚书》翻译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大陆学者刘家和、邵东方与美国的费乐仁合作的《理雅各英译〈书经〉及〈竹书纪年〉析论》,笔者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遭遇古奥:解读理雅各的〈书经〉译本》(郑丽钦,2006)与郑丽钦的《浅谈〈尚书〉“惟”字的英译》。

涉及《礼记》翻译研究的成果有笔者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理雅

各英译〈礼记〉研究》(宋钟秀, 2006)。理雅各的《礼记》译本(《东方圣书》卷27、28)也有关于汉学家卡勒睿的译本的评论。

涉及《周易》翻译研究的成果有大陆语言学者李贻荫、王平的《〈易经〉四种英译的比较研究》, 邵毅的《理雅各英译〈周易〉研究》, 杨宏声的《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 笔者的《〈周易〉英译风格探微》、《〈周易〉英译的失与误》、《初探〈周易〉英译》、《国外易学翻译及研究简介》与《略论音译与东方传统文化》及笔者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理雅各、贝恩斯英译〈周易〉比较研究》(郑和明, 2006); 此外还有大陆历史学者林金水的《〈易经〉传入西方考略》与美国汉学家卜德的《〈周易〉译本评析》。

涉及《春秋左传》翻译研究的成果有香港大学的单周尧教授《训诂与翻译——理雅各英译〈左传〉管窥》与笔者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两部〈左传〉英译本的比较研究》(陈慕华, 2006)以及陈慕华的论文《析〈左传〉英译本的失与误》与《两种〈左传〉译本的译文风格研究比较》。

从多学科视角进行综合研究的有费乐仁的系列论著, 包括《以意逆志——理雅各解读儒家典籍》、《理雅各: 苏格兰式的现实主义与十九世纪的汉籍西译》、《理雅各著述研究的新视点》(上下篇)、《神学术语汉译论》与《翻译百科全书》的理雅各条目等等。费乐仁研究理雅各的新作《为了人生的责任: 苏格兰新教传教士理雅各遭遇中国》是一部力作。费乐仁与大陆学者刘家和、邵东方合作研究理雅各的儒经译著, 其中最大的成果是《理雅各〈中国经典〉译本研究》(待出)。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有诺曼·吉拉多特的《理雅各与中国经书》、大卫·哈尼的专著《神坛焚香: 汉学家先驱与中国经典文献的发展》。英国学者的研究有鲍理斋的《圣书主题的英国翻译家与四书》。中国学者的论、著有香港刘子濬的《理雅各与中国文化: 学术、翻译与福音事业研究》、黄文江的《理雅各: 中西十字路口的先锋》、大陆学者王辉的《理雅各与〈中国经典〉》与笔者的《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

来自不同地域的学者之研究各有千秋, 给笔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